

蒋绍愚 胡敕瑞 主编

汉译佛典语法研究论集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语言接触与汉译佛典
语法比较研究——以梵汉对勘为基础”(05JJD740177)研究成果

汉译佛典语法研究论集

蒋绍愚 胡敕瑞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译佛典语法研究论集/蒋绍愚,胡敕瑞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023-0

I. ①汉… II. ①蒋…②胡… III. ①佛经—语法—文集
②汉语—语法—文集 IV. ①B94-53②H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264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佛典语法研究论集

蒋绍愚 胡敕瑞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023-0

2013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8 3/4

定价: 79.00元

目 录

汉译佛典语法研究述要	朱冠明(1)
再谈中古译经与汉语语法史研究	遇笑容 曹广顺(46)
简论义净所译佛教律典中的句法处理	
——以出土梵本与汉译本的对勘为依据	陈 明(70)
玄奘译经的语言学考察	
——以《阿毗达磨俱舍论》梵汉对勘为例	王继红(107)
论部汉译佛典篇章标示成分考察	
——一项关于《阿毗达磨俱舍论》的个案研究	王继红(123)
汉译佛经中增译的话题转移标记	
——以《妙法莲华经》的梵汉对勘为基础	姜 南(143)
佛经汉译中呼格的凸显与转移	姜 南(157)
也谈汉译佛典中的“NP ₁ , NP ₂ + 是也/是”	蒋绍愚(166)
汉译佛经“S, N 是”句非系词判断句	姜 南(182)
代用与省略	
——论历史句法中的缩约方式	胡敕瑞(195)
汉语负面排他标记的来源及其发展	胡敕瑞(208)
汉译佛经句末“故”用法考察	
——以《阿毗达磨俱舍论》梵汉对勘为例	王继红 朱庆之(229)
句尾“来”体貌用法的演变	陈前瑞 王继红(246)
理论与事实:语言接触视角下的中古译经语法研究	遇笑容(260)

2 汉译佛典语法研究论集

语言接触的一个案例

——再谈“V(O)已” 蒋绍愚(271)

附录:

《法华经》梵汉对勘(第四品) 姜 南(288)

《佛所行赞》梵汉对勘(第一品) 邱 冰(517)

后记 (614)

汉译佛典语法研究述要^{*}

朱冠明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汉译佛典作为一种有着较高的语言研究价值的文献,在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① 有关汉译佛典语法特点的研究,以及利用汉译佛典语言材料而进行的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以及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近些年梵汉对勘这种佛典语言研究方法得到更多的应用,语言接触理论也被有意识地运用到对佛经翻译带来的印欧语影响汉语的研究之中,出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促进了佛典语法研究的发展。本文拟对汉译佛典语法研究的整体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介绍,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展开:佛典语言的性质及其在语言研究方面的价值;佛典特殊语法现象研究;梵汉对勘与佛典语法研究;语言接触理论与佛典语法研究。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2005 年度重大项目“语言接触与汉译佛典语法比较研究——以梵汉对勘为基础”(项目批准号:05JJD40177)的一部分。本文从提纲拟定到材料的组织以及细节调整,都是在蒋绍愚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谨致谢忱。吴娟博士也为本文的修改提供了很好的意见。文中错误和不当之处由作者负责。

①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也有一些研究佛典语法和利用佛典材料研究汉语历史语法的成果,但总体上看,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佛典的研究非常有限。详参朱庆之、朱冠明(2006)。

一 佛典语言的性质及其在语言研究方面的价值

佛典语言的性质与佛典语言的特点密切相关。早在1920年,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便指出佛典与中土文献在“语法及文体”方面迥然殊异最显著者共十条,如第一条“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第三条“倒装句法极多”,等等。(梁启超,1920/1989)梁文是从文学的角度、基本上凭语感来对佛典语言特点进行的概括,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不过他并没有对这些特点进行具体分析,更没有由此进一步来探讨佛典语言的性质。

真正从语言学角度论及佛典语言特点及其性质的是许理和(Zürcher, 1977/1987),他明确提出分析东汉佛经译文的语言时,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1)佛经译文的语言必然受到传统文言的影响;2)佛经的印度原文对佛经译文的语言会有干扰;3)译经者往往喜欢用四字格式;4)有些佛经译文可能是很糟糕的中文,有时甚至是西域混杂语。这四点相当准确地概括了佛典语言的特点,后来的研究大体上没有超出这个框架。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之后,许指出:“印度语对佛经译文的干扰看来并不大”;“东汉佛经译文的语言尽管有某种程度的程式化,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洛阳地区的口语的”。可见,许尽管认识到佛经译文中可能混杂着印度语或西域语的成分,但他大体上是将佛典语言视为当时洛阳地区的口语的,这当是他对东汉佛典语言性质的看法。

但许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讨论佛典语言的特点及其性质,而是强调它的口语性来“引起语言学家对东汉佛经的注意”。朱庆之(2001)是第一篇深入探讨佛典语言性质的文章,此文中朱全面论述了“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称的理论内涵,引起很大的反响,使学界更多地关注到佛典语言的特殊性。下面我们从“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目及对它的相关讨论谈起。

1.1 “佛教混合汉语”及相关讨论

朱庆之(1992:15)提出“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称;^①朱庆之(2001)对这一名称的内涵做了具体的论述:“佛教混合汉语与其他中土文献语言有明显的差别,是一种非自然产生的独特变体。这主要表现在两种混合上,一是汉语与大量原典语言成分的混合,二是文言文与大量口语俗语和不规范成分的混合。”朱分别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举例证明了佛典语言的这两种混合。正因为有原典语言成分的混合,朱特别强调了梵汉对勘方法对佛典语言研究的独特作用。

最早对“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称提出异议的是台湾学者万金川。他(2002)^②认为这一名称显然是受到爱哲顿(F. Edgerton)所使用的“佛教混合梵语(Buddhist Hybrid Sanskrit)”的启发。但是爱哲顿所谓的“佛教混合梵语”是一种受到标准梵语深度影响的中古印度方言,在音韵、形态及语法上都有其特殊性,是基于地缘关系的语言接触而产生的一种混合语。而朱所谓的“佛教混合汉语”,既没有基于地缘关系的语言接触,也没有深度的语言影响,充其量只是语码混杂,还达不到语言学中所谓的“混合语”的程度。不过万也认为作为一种修辞策略,用“佛教混合汉语”来概括佛典语言的一些风格特点,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有正面意义的,即提醒我们汉译佛典既不是纯粹的中土文献,也不是原典的复刻或拓本。

遇笑容(2008)分别从梵汉对勘、同经异译和中古译经中的特殊语言现象几个方面,对汉译佛经的语言性质进行了讨论。因为这三方面都显示汉

① 在朱庆之(2001)一文的注释①中,朱指出“它(佛教混合汉语)的英文名称 Buddhist Hybrid Chinese 却是西方汉学界早已有之的说法,也有国外学者用 Buddhist Hybrid Sinitic, 缩略 BHSi (Mair, 1994/2009)”。笔者见到何莫邪(Harbsmeier, 1989)用 Buddhist Hybrid Chinese 来指称《百喻经》这种受到梵文严重影响(heavily Sanskrit-inspired)的口语文献;又,梅维恒(Mair, 1994/2009)用 Buddhist Hybrid Sinitic 来指称佛典语言,主要是强调它是一种掺杂了很多口语成分的书面语,而未提及它与原典语言的关系。

② 万金川(2002)主要针对的是朱庆之(1992)所提出的“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称,因为从行文中可知他当时并未见到朱庆之(2001)这篇文章。

语在佛经翻译中受到的梵文影响相当有限,所以佛经汉语“基本上是一种中介语,是西域僧人学习汉语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记录。其中出现的特殊语言现象,是他们学习中出现的母语干扰”。这个结论否定了该文开头引述的“有人认为(译经语言)是一种洋泾浜汉语,是梵汉混合语”的观点。

正是因为学界存在着对“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称的不同看法,朱庆之、朱冠明(2006)在注释②中做出说明:“Hybrid 这个词在(国外)语言学里通常指由不同语言中的词组合成的合璧词,或者与形态有关的混合,因此有学者不同意这个说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现在我们更多地是用‘佛教汉语(Buddhist Chinese)’这个词。”

“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称的提出是着眼于它与中土文献语言的差别,但名称本身会使人认为佛典语言已经具有了“混合语”的地位。这方面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佛典语言性质的认识。抛开这一名称本身不谈,朱庆之(2001)对佛典语言的特点即“两种混合”的概括,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正是这两种混合,决定了汉译佛典在语言学上重要的研究价值。

1.2 关于佛典语言的口语性

汉语学界对汉译佛典的重视,是因为认识到佛典语言极强的口语性。太田辰夫(1958/2003:375)指出在唐以前“译经应该进一步大量使用”;许理和(Zürcher,1977/1987)也说“和同时期的非宗教性文献比较,东汉佛经译文中的口语成分要多得多”;周祖谟(1979/2001:12)、吕叔湘(1980:81)都指出佛经“接近口语”或“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正因为佛典语言口语性强,且数量庞大,而同期(东汉至隋唐)口语性强的中土文献十分有限,这使得佛典对汉语史研究弥足珍贵。如方一新(1999)所言,较早的研究往往只注意中土文献,而近年“有关的论著中征引佛典语料已成为通例”。

对佛典语言的口语性进行研究和介绍的文献,除前文及注释中提到的朱庆之(2001)和梅维恒(Mair,1994/2009)外,还有俞理明(1993:5—9)和许理和(Zürcher,1996/2008)等。俞对不同性质的佛典分别讨论,指出律藏

是“佛经中生活气息最浓的部分”,而本缘部的经文则“故事性最强”。许理和在讨论佛典语言的口语性方面更为细致和深入。同许理和(Zürcher, 1977/1987)相比,他(Zürcher, 1996/2008)扩大了所讨论的佛典口语的范围,不再限于东汉而是扩展到5世纪初。之所以将下限定于5世纪初,是因为他认为鸠摩罗什以后的译经基本上已经程式化,不再吸收活语言成分。他分六个步骤逐步剔除那些不符合口语特征的佛典,即以六种语言现象为标准,凡是具有这些语言现象的佛典都不是真正的口语文献。这六种语言现象包括纯文言、文言化、翻译腔、列举性、诗律化、四字格等,它们都会扭曲真实的口语。经过这样严格的筛选,他得到一个包含最佳源材料(即高度口语化)的语料库,计有佛典86部,230卷。这个语料库完全可以作为汉语史(尤其是中古汉语)研究的首选语料,而一些包含较多口语成分却被排除在外的佛典(如《六度集经》、《生经》等),则可作为第二梯队的语料。^①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在利用佛典语料时,佛典口语性常常会被无限夸大。朱庆之(2001)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那些不经见的语言成分和现象往往都被认为是口语和俗语的成分,进而希望在更早的文献中寻找来源;相反,佛典语料的特殊价值被忽视了……佛教混合汉语同时又是研究佛教对汉语及汉文化影响的第一手资料的价值未能得到重视。”朱文证明,那些不经见的语言现象往往可能是来自原典语的影响,或是对汉语的误用。

我们认为,笼统地说,佛典语言的口语性强,这是和同期的中土文献相对比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应该认识到的是,具体到某一部佛典,则它们的口语性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的。从时代上看,鸠摩罗什之前的佛典口语性高于其后的;从佛典的类型上看,律藏及经藏本缘部口语性要高于其他类型;从不同译师的不同风格来看,有些译师如支谦、康僧会等的译经文言化程度更高一些。有时同一译者的不同译经,口语化程度也不一样,如同为

^① 详参朱冠明(2008a:243—246)为许理和(Zürcher, 1996/2008)一文写的“译者后记”。

竺法护译的《生经》和《正法华经》,前者口语性明显高于后者。甚至同一部佛经内不同部分,其口语性也会有显著的差别,如许理和(Zürcher, 1996/2008)所举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整体上看这是一部冗长的列举性的佛经,但是它的最后两品,却与其他不同,完全是叙述性的。所以许理和说:“最终的最佳材料的语料库,其构成不是一部部的译经,而是这样的篇章和片断。”

1.3 关于佛典中的原典语影响

早年的研究基本上是将佛典当作与中土文献性质相同的语料来使用,而忽略了它是翻译作品这一根本特性,从而忽略了佛典语言中原典语言成分的存在。近年的研究表明,佛典语言是夹杂着原典语言成分的,既包括词汇性成分,如佛典中大量的音译词或仿译词;也包括一些语法成分。朱庆之(1993;2001)、辛嶋静志(1997)、万金川(2002b)等都特别强调了佛典的翻译属性。如朱庆之(1993)写道:“汉译佛典语文除了包含有极其丰富的、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汉语实际的语料外,其中也还含有大量的原典语文成分。这些外来成分披着汉语的外衣与汉语固有的成分混在一起,如果不加以甄别,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研究结果(例如将某些外来语成分当作汉语固有的东西),甚至影响佛典语料的广泛利用和深入研究。”相对而言,遇笑容(2008)则持更为保守和谨慎的态度,她一方面承认佛典语言“可以看到梵文的影响”,但同时指出这种影响非常有限,在语法方面,目前大家提出的总共不超过20项。

我们认为,同口语性一样,不同佛典其语言中的原典语影响也有程度的差别。最极端的例子,如隋代笈多所译《金刚经》^①:

(1) *evam ukta āyusmān subhūtir bhagavantam etad avocat*
如此说 长老 须菩提 世尊 此说

① 参见朱庆之(2006)、遇笑容(2008)有关笈多译《金刚经》语言性质的分析。

ko nāmāyaṃ bhagavan dharmaparyāyaḥ katham cainaṃ dhārayāmi^①

何 名 此 世 尊 法 门 如 何 和 它 记

今译:(世尊)这样说的时候,长老须菩提问:“世尊啊!这法门叫做什么?我如何记住它呢?”

如是语已,命者善实世尊边如是言:“何名此,世尊!法本?云何及如此持我?”(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8/768b)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8/750a)

可以看到,笈多的译本不仅是逐字硬译,在语序上和梵文完全一致,而且还有意识地用“边”和“我”将梵文的形态成分硬译出来:原典中 bhagavantam 是宾格形式,作动词 avocat 的宾语,笈多用“边”来对译其宾格形式;^②dhārayāmi 则是第一人称单数致使式主动语态,笈多用“我”来对译表示一人称单数的词尾-mi。笈多这种翻译,正是许理和(Zürcher, 1996/2008)所谓的“翻译腔”,“在那些译经中汉语被彻底地扭曲,目的在于试图尽可能地接近其非汉语原典,最极端(绝非罕见)情况下——至少对现代学者而言——假如手边没有印度原本,根本看不懂。”相比之下,鸠摩罗什的译本则汉化程度高得多,基本是规范的汉语的用法。

再如竺法护与鸠摩罗什所译《法华经》的对比:

(2) āścaryabhūtaḥ sugatāna ghoṣaḥ kārṇikṣāṃ ca śokaṃ ca jahāti prāṇināṃ

奇特的 诸佛的 声音 疑惑 和 痛苦 和 消除 众生的

kṣīṇāsravasya mama yaś ca śoko vigato asti sarva śruṇīyāna ghoṣaṃ^③

诸漏消除的 我的 凡 和 痛苦 离开 是 一切 听见 声音

今译:诸佛的声音是多么奇特啊,它消除众生的疑虑和痛苦;(尽管)我的烦恼已尽,在听到那个声音之后,所有痛苦也都消失了。

假使有人,能造行者,闻安住音,以为奇雅;诸尘劳垢,鄙已竭尽,音声之信,亦

① 梵文见许洋主(1995:227)。

② 关于译师常用“边”来标示原典语的宾格(accusative), Watters(1889:381)已经指出过这一点。

③ 梵文见蒋忠新(1988:60)。

悉永除。(竺法护译《正法华经》,9/73b)

佛音甚希有,能除众生恼;我已得漏尽,闻亦除忧恼。(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9/10c)

护译基本还是在逐字对译,虽然语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而什译完全符合汉语的习惯,这样读起来也比护译好懂得多。因此从译文所受到的原典影响来看,笈多是最极端的,鸠摩罗什是受影响最小的,而竺法护介于二者之间。

不管怎样,佛典是翻译作品,其语言多多少少受到原典语的影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哪怕像鸠摩罗什这样以译文通达著称的译师,其所译《妙法莲华经》仍然“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赞宁《宋高僧传》,50/724b),可见他的译文也摆脱不了母语的影响。至于目前所发现的受原典影响的语法形式并不多,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为相对词汇而言,语法的影响要隐晦得多。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进展,对佛典语法受外来影响的发现会越来越多。

1.4 佛典的语言研究价值

如上所述,佛典语言一方面含有丰富的口语成分,一方面也包含着诸多原典语言成分,这是佛典语言最突出的两个特点,也决定了它在语言研究上无与伦比的价值。

中古时期口语性强的本土文献并不多,而佛典不仅口语性强,而且数量庞大、反映社会生活面广,且翻译年代多数可考,这使它在汉语历史词汇语法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①正如曹广顺(2006)所说:“在剥离了梵汉对照的部分之后,我们相信中古译经的语言基本上是一种相对接近当时口语的语言,对中古汉语研究有重要价值,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许多仅凭本土文献无法解决的问题。”据朱庆之(1992:38)统计,中古汉文佛典传世的

^① 此外,佛典中有大量的音译词,因此对汉语音韵研究也有极高的价值。参见朱庆之(2000)的相关介绍。

大约有 960 部,2990 卷,2400 万字;即以许理和(Zürcher, 1996/2008)所精选的“最佳语料库”而言,也有 86 部,230 卷,近 200 万字,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另外,佛典尤其是律藏部分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之广,也是中土文献无法比拟的。朱冠明(2008a:3,9)谈到了这一点:“(《僧祇律》)记载的大量的制戒缘由故事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面之广,举凡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市井买卖、詈骂殴斗等无不包括,是一般正统文献无法比肩的。”“对日常琐事如此细致的描述,不要说崇尚典雅的中土文献,就连佛典经部文献中也不多见。这正是律部文献的独特价值所在。”

佛典作为翻译作品,是由佛经翻译带来的汉语与以梵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语言接触的产物,这又使它成为研究语言接触及其给汉语造成的影响的绝好材料。从东汉至宋代持续长达千年的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以及佛典的宗教性质,使佛典中的一些非汉语成分能够在大众中发挥持久而深入人心的影响,从而融入汉语而成为汉语的一部分,这已为现有的研究成果所证明。过去的研究不太关注汉语发展史上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而当前学界越来越认识到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因,汉语也不例外。语言接触及对汉语的影响已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佛典语言可以说是研究汉语在中古时期所受外来影响的最佳也是唯一的材料。朱庆之(1993、1995、2000b、2001)、遇笑容(2004、2006、2008a、2008b)等已经做出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其中遇笑容置于语言接触理论之下的研究,更突显了佛典在语言接触研究上的价值。这些方面我们后文还会详细介绍。

二 佛典特殊语法现象研究

2.0 佛典语法研究概况

汉译佛典语法研究,以及利用佛典材料进行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不仅成果越来越丰富,而且研究的领域更广,方法也更多样化,在很多问题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据朱庆之、朱冠明(2006),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佛典语法研究的相关著述屈指可数,其中海外学者的研究又占了多数,国内学者的佛典语法研究只是零星出现过几例;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仅据朱庆之、朱冠明(2006)文后所列参考文献,有关佛典语法研究的论著即有不下 200 种,而这还未包括为数不少的未发表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

从研究领域上看,几乎所有汉语历史语法所关注的问题,在佛典语法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如功能词方面,人称代词“他”、“自己”,指示代词“这”、“那”,疑问代词“那”,各类助动词,形成中的助词“了”、“着”、“底”以及与其形成密切相关的“已”、“所、许”,语气词“那”、“为”、“不”、“来”,还有众多的副词、介词、连词等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句法方面,判断句、动补结构、处置式、被动式、选择/反复问句、比拟式、受事主语句等一些语法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也成为佛典语法研究的中心问题。除此之外,还不乏佛典语法自身特点的研究,如“四字格”及其对佛典语法的影响、佛典惯用句型(如开场白“与……俱”)的发展和定型、从语法角度对佛典翻译年代及译者的考辨等等。

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历史语法研究的基本方法外,还针对翻译佛典的特性,采用了“同经异译对勘”、“梵汉对勘”等有效的研究方法,使佛典语法的研究别开生面。

以上所述有关内容的研究情况,朱庆之、朱冠明(2006)都有较详细的介绍,可参看。本文重点介绍佛典中一些特殊的、近年来讨论相对较多的语法现象的研究。所谓特殊,是与同期中土文献相比较而言,佛典有而中土文献没有、或者在出现频率上佛典远远超过中土文献的那些语法现象。

2.1 衬音词“于”的研究

佛典中有大量的主要用于及物动词和宾语之间的“于”，这个“于”没有任何意义，多数情况下只是为凑成四字格而增加一个音节，故称之为“衬音词”。据许理和（Zürcher, 1991/2001）、俞理明（1993:29）等研究，四字格从东汉末开始大量使用，成为佛典的主导句式。为构成四字格，译师们采用了多种手段，其中便包括使用这个“于”，如：

（3）奉养老母/供养于母；欲入海去/遂入于海；来迎之者/来迎于我；受大快乐/受于快乐。（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4/450c-451b）

这是《杂宝藏经》卷一“慈童女缘”这则故事中连续出现的几组四字格例句，可以看出用“于”与否完全取决于音节增减的需要。早在20世纪40年代，周一良（1944、1947—1948）就注意到这一现象，认为“‘于’在先秦两汉的书里，没有用在他动词与宾语之间的”；“六朝译经中才有这种用法……大约最先是在韵文中凑字数，逐渐在散文里也流行起来”。此后自许理和（Zürcher, 1977/1987）开始，又有十数篇文章先后对佛典中“于”的使用提出己见。除指出佛典中这一特殊语言现象外，还就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

1) 是否最早出现在译经中。梁晓虹（1985）认为“于”用于及物动词和受事宾语之间，“似乎是上无来者（上古汉语没有这种用法）”。刘瑞明（1988）针对梁文，指出先秦文献中已多见动宾之间用“于”字的例句，并举有40余例。不过刘也承认这类“于”在佛经中使用得更为广泛：“正因为上古早有这种用法，译经的西域僧人便推而广之，大量地用在译文中求得四字句或双音节停顿的整齐和易读。”刘的观察是有意义的，^①表明“于”的这种用法渊源有自。但应该指出的是，刘文所举这些例句中的宾语，大多并

^① 杨伯峻（1982）已指出古汉语中“于”的这种用法。

非典型的受事宾语,这一点董秀芳(2006)已做了明确的说明。而佛经中“于”后常常是典型的受事宾语,这表明佛经中“于”的用法与上古汉语还是有所区别的。

2)是否只用于及物动词与宾语之间。佛典中这类“于”除主要用在动宾之间外,还有更广泛的使用。朱庆之(1992:229)首先注意到这个“于”并不限于用在动词和宾语间;魏培泉(1993)举到了“于”用于系词“是”和“及”、“为”、“以”等介词后的用例,并分析“于”可以用来凑音节的原因与它的介词功能的丧失有关。颜洽茂(1997:205)还举出了“于”用于连词后的用例,董志翘(2000:348)也举出了“于”用于表被动的“被”字后的用例。

3)是否用来凑音节。关于“于”的性质和功能,如上所述,多数学者认为是译师为构成四字格而用来凑音节的。许理和(Zürcher, 1977/1987)认为它是把直接宾语介绍给主要动词的“宾语助词”,并认为“它很可能是3世纪口语的一个特点”。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于”在3世纪以后的佛典中有更多的使用,且多用来凑成四字格,而同期中土文献则不多见,所以很难说是口语的反映。

最近姜南(2008a)对“于”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她通过梵汉对勘的材料,提出“译经中动名间‘于’的真实身份是引进包含受事在内的语义格标记”,认为“‘音节衬字’说难于立足,充其量可以算作‘于’的附属功能”。姜用《法华经》的梵汉对勘材料,说明汉译中用“于”的地方,其原典梵文都有相应的名词格尾变化,所以“于”的“格标记性质显著”。姜通过梵汉对勘来探求“于”的性质和功能,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不过她的论证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梵文形态高度发达,进入梵文句子的任何一个名词都有格尾变化,因此汉译中任何位置上的汉语名词所对应的原典梵文一定都有格尾变化,按姜的逻辑则任何一个靠近名词的词(如各类介词)其“格标记性质”都会很显著。其次,姜的对勘材料显示,处于动名之间的“于”对应的梵文名词可以是体格(Nominative)、业格(Accusative)、从格(Ablative)、属格(Genitive)、依格(Locative),表明它几乎无所不能,那么它作为一个格标